

《指日高升图》：古代官本位文化一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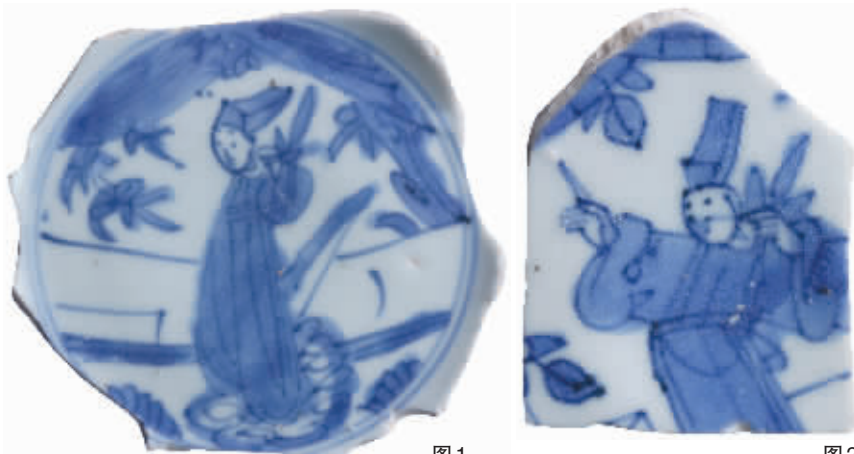


图1

图2

■浙江杭州 李熊熊

“指日高升”是明清时期常用的一句吉祥语，最早出现于明代程登吉编的《幼学琼林》。《幼学琼林》是教儿童各种生活常识的书，其中有这样一句：“代天巡狩，赞称巡按；指日高升，预贺官僚。”可见，“指日高升”是预祝升官用的吉祥语。中国古代是个强调官僚等级的社会，所以明清瓷器上以“指日高升”为题材创作的瓷画有不少。本文通过分析其中四种画面，来一窥古人内心的官本位文化。

第一种与“天官赐福”有关。“天官”原本是道教想象中的在天上具有官位的神仙，也称“仙官”。道教很早就有供奉天官、地官、水官的传统，认为“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而“上元为天官赐福之辰”。“上元”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夜，民间有许多庆祝活动，“天官赐福”是其中的一项习俗。这项喜庆的习俗，自然有机会反映到瓷画中来。

图1正是明代后期经典的“天官赐福”瓷画：一位天官踏云下凡，来人间赐予福报。他的基本特征是：头戴一顶高

矗的帽子，这是道士常用的庄子巾式样，表明他是道教“天(仙)官”；左手持有一丛竹叶，以谐音“祝”表示祝福、祝贺之意。“天官赐福”一般是泛指，可以应用于不同身份的人物和场合。但细分起来，天官的祝福也可有不同的内容，比如有的“天官赐福”图中，天官身边画着一对桃实，这是在暗示他所赐的是长寿。图2中的天官左手持竹叶，右手指天，则显然是在示意“指日高升”。

我们比较图1和图2这两幅瓷画可以看到：图1是泛指的“天官赐福”，天官



图3

矜持的神态有一种神人之间隔阂；而图2中的天官在向人间官员表达“指日高升”的祝福，他略带妖娆的身姿竟有些献媚的意味。这种细微的区别，反映的其实是画师心目中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下意识。

第二种是以儿童为主体的“指日高升”图，代表作是图3这幅清初的瓷画。画面中的儿童一手持莲花，莲花高高的茎干象征着高升；一手指向天上的红日，表示“指日高升”之意。整幅画的画意还在两句题诗中表达得更清楚：“三公应得路，指日望凌云”。“三公”在古代指太师、太傅、太保这三个最高等级的官职，诗意是：“三公”这样的高官应该是找到了一条成功捷径，所以能指日高升实现凌云之志。

这两句题画诗表达了民间对做大官的羡慕心态，但普通人真想找到一条“指日高升”的路无异于白日做梦，即使只是说说也显得十分幼稚。而童言无忌，说这样的话倒是恰当的天真。以儿童的身份来表达“指日高升”，既说出了民众内心深处对官位的向往之情，也避免了现实中真去追求可能遇到的尴尬。

第三种画面是由官员来表达“指日高升”的愿望。图4也是清早期的一幅瓷画，画面中有一位腰悬宝剑昂首挺胸



图4

的武官，一手端着舍我其谁的架子，一手指着天边的太阳，似乎正在抒发“指日高升”的雄心壮志。

官员是已经在官场上厮混的人，他们既然走上了仕途，当然期望能更上一层楼。从图中官员踌躇满志的肢体语言看，他对自己“指日高升”，做人上人充满了信心。

第四种是从小民的角度来表现“指日高升”，图5就是这样的一幅瓷画。画中小民不是盼望自己做官高升，而是在向有资格做官的人表达对他们的祝福。你看，小民看见官员马上流露出诚惶诚恐之态，习惯性地先跪下再说话。这种肢体语言，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跪在地上的小民，一手指天一手指一顶帽子巴结地递上。帽子在古代也称“冠”，与“官”谐音，所以送帽子有祝福升官之意。这幅图将中国古代小民见到官的那种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活灵活现，堪称传世杰作。

上述四种《指日高升图》瓷画，以四类人物为主体表达出四种对“官”的认知和心态，可以说是比较立体地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本位文化。这种官本位文化讲求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是等级差异。从现代文明的角度看，官本位思想是一种封建糟粕，应给予批判。



图5

由明万历《僧侣观瀑》瓷画想到的

■浙江金华 曹兆燎

图中所示是一幅明万历时期的《僧侣观瀑》瓷画。画面上，一位持杖僧人，站在一块开阔石潭边缘，周围绿树成荫，若有所思地注视着眼前飞流而下的瀑布。整个画面布局合理，极富意境，引人遐思。有观者不禁会问，这位僧侣是谁，他又在思考什么？显然，答案并不是唯一的。不过，在考证过程中，笔者却找到一位万历时期颇具传奇色彩的僧侣人物，值得一探。

明万历时期，由于仁寿皇太后和万历生母慈圣皇太后两宫皆崇信佛教，好多太监也佞佛。这时有一位法师因振兴佛教事业和发展佛教规模有作为受到后宫的重视；但也因此被牵涉到政治斗争中，因伤害到利益集团而丧命狱中。

他便是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真可，字达观，晚号紫柏，门人称其为尊者。出家前世居吴江太湖。真可少年时即行侠仗义，抱负远大。十七岁那年，“仗剑远游塞上”，当行到“苏州阊门，大雨阻行，遇到虎丘僧明觉以伞蔽之同归寺中，闻僧夜诵八十八佛名，心生愉悦，遂剃发礼觉为师。二十从讲师受具足戒。”真可从此与佛有缘。出家当天一人在房静坐到天亮，从此因缘，终其一生“肋不至地，夜不倒单。”

真可真是个做事、读书极认真的人，学无定师，涉猎广泛，见识广博。后人评价他“外则会通三教，内则融通性相，会归各家。”经常在阁楼上研读佛经一年半载



不下楼，曾在嘉兴乐塔寺见一僧书写《华严经》，跪看良久。之后至武德景德寺闭关参佛经，悟佛理三年。出关后，返回向明觉告假辞别说：“吾当去行脚诸方，历参知识，究明大事也。”即策杖而去。

于行脚途中，真可经历了由疑惑至极的困境到豁然得悟的修证过程。一日闻一僧诵张拙的《开悟偈》至“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时，心生大疑，便将这两句抄在墙壁上每日参究，直到头面俱肿。一日斋时，忽然大悟，头面肿立消。从此参华严大老遍融，禅门宗匠笑岩，暹理处。大量阅读，遍访参修，与各宗门泰斗过招，奠定和锻炼了真可的佛学基础和动力。

在明代，刻用的藏经版一般都藏于官府之中，请出来印刷流通经藏非常不易，僧俗间早有各行制版刻印的想法。但苦于事宜重大，经费难筹而无行动。

真可闻讯后，立刻表示有刻藏的必要，于是他发愿倡导刻藏，力排众议，以方册代替原有的梵夹装来装订藏经。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决定，佛经因此改变而有了更为广阔的流布空间。在经费的问题上，真可坚持广募善资，让天下众生都能得到布施的机缘，以广植善因，当慈圣皇太后得知真可刻藏之举，欲下令动用国库，真可婉拒她的好意。这部大藏经因在浙江嘉兴楞严寺刻印，被后世称为《嘉兴经》。

除了藏经的刊行，真可对于中国佛教的另一大贡献便是广兴寺院。真可所到之处，每见古刹荒废或为强豪所占，必意立志兴复。有人施建禅堂，礼请大师作联：“若不究心，坐禅徒增业苦；如能护念，骂佛犹益真修。”

由于前朝嘉靖信道，对佛教的破坏和打击，兴复寺院的工作一般都十分艰辛，尽管如此，真可从楞严寺开始，一直到京门房山云居寺、谭柏寺，前后共兴复了十五座寺院。

真可既注重学识的长进，也善于交往。他是兼通儒道的和尚。儒释道三教皆修。名儒管东溟是他的莫逆之交，很多士大夫，及著名文人如冯梦祯、陆祖光、王肯堂、汤显祖等人，也多从其交游。一代高僧憨山德清更是其同道挚友，据说曾对谈“四十昼夜，目不交睫。”同时也有人评论他“达观时游贵人门”，语虽有贬义，由此可见他的交游之广。

其实真可最让人注目的事系他是关

心时政之僧。万历二十八年，为增加皇室收入，征收矿税。宦官趁机扰民，从中牟利，宫中太监及其党伙，一时“或专或兼大璫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天下咸被害矣”，以到“民不聊生，随地激变”，官即不狼狽为奸，亦多不敢抗争。南康太守吴宝秀拒不执行征税令而被捕入狱，夫人愤死。真可闻之极愤，“遂策杖赴都门”。经多方奔走，吴虽然被释放，但苛敛矿税未止，加上德清这个时候也因扯进宫廷纷争而被内宫弹劾，被以“私创寺院”罪充公军岭南。真可慨叹“老憨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业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由此可见，令真可感悲愤而最想解决的三件事，皆涉及时事。

涉世过深，得罪既得利益的宦官，且时游贵人门，卷入官场是非，的确是使真可招使打击迫害的主要原因。在万历时祈嗣、立储、开矿以及税收都是朝廷各方势力争夺夺利的焦点。只要触碰到其中一方的神经就会遭到群狼的攻击。京城形势对真可极为不利，门人弟子纷纷写信劝他离京归山，真可为了三大负事不为所动。刚好又遇上万历时著名的“妖书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遂被捕入狱中，从被捕到判罪，只有短短十五天，真可对当局草草定罪，“执政欲死师”，感到相当失望，于是“素浴罢”自去，愤死后，又“坐凤露中”，暴尸六日才被门人收尸葬于慈慧寺外。

因为他的出世、救世，伤害了那些披着宗教外衣人的利益，就这样一代高僧真可成了历史上首个与矿税斗争而被害的和尚。